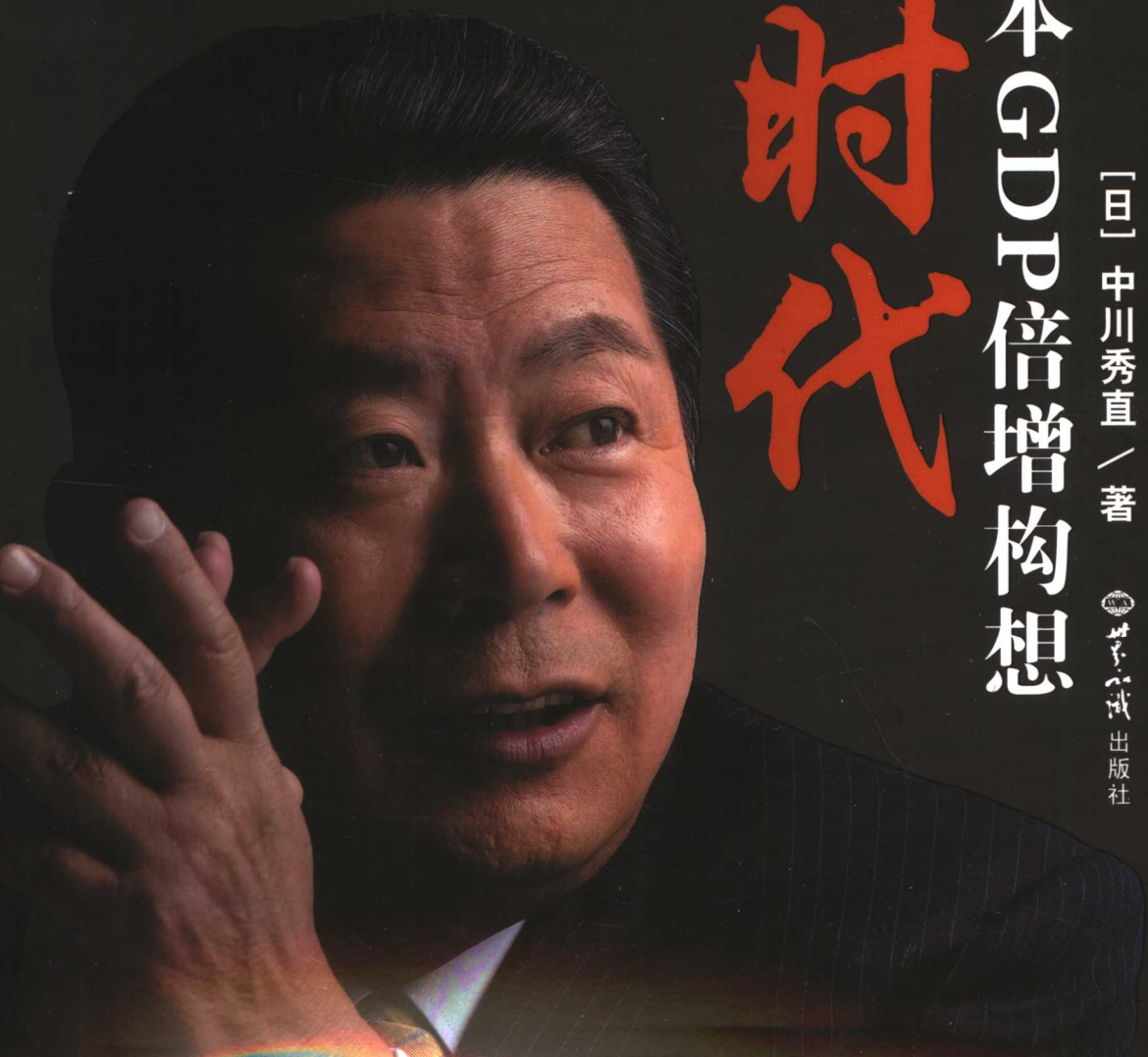


涨潮时代

——日本GDP倍增构想

〔日〕中川秀直／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涨潮时代

——日本GDP倍增构想

「巨」中川秀直／著

 学芸出版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涨潮时代:日本 GDP 倍增构想/(日)中川秀直著;朱建荣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3

ISBN 978 - 7 - 5012 - 3327 - 4

I. 涨... II. ①中...②朱... III. ①政治—研究—日本—现代②经济—研究—日本—现代 IV. D731.30
F1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1904 号

图字: 01 - 2008 - 1020 号

责任编辑 罗养毅

责任出版 刘 喆

责任校对 王 铮

封面设计 刘 凌

书 名 涨潮时代——日本 GDP 倍增构想
Zhangchao Shidai

作 者 [日]中川秀直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20 × 1020 毫米 1/16 15 印张 6 插页

字 数 184 千字

版次印次 2008 年 3 月第一版 200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012 - 3327 - 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致中国读者

在我的记忆里，2006年初，是自己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季节之一。日本各地普降大雪，中国大陆的北方各地也是天寒地冻。这年2月，我率领日本执政党代表团从东京来到北京，参加日中之间达成建立执政党交流机制协议后的第一次交流。

这之后的2007年3月和11月，我又到北京参加过党际对话交流和在几个著名研究所做演讲，我感到气候很暖和，甚至外出也不必穿大衣。

想必大家都知道，这种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与日中两国关系的气氛变化完全一致。2006年10月，安倍首相当选后十二天就到北京访问，达成了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协议，他的访问被誉为“破冰之旅”。2007年4月，中国的温家宝总理来日本访问，被称为“融冰之旅”。年末，福田首相又来到北京，受到中国方面的热情接待。温总理说：中日关系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两国领导人打破了隔阂中日关系的三尺之冰，我为之由衷高兴。尤其是作为日方执政党负责人之一，与中方的执政党一起，参加了破冰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两国执政党之间再次确认了“以党促政”、即在政府之间交流出现停顿时执政党之间加强交流以作弥补的良好传统。

但是，虽然是春天了，水面下还会有“流冰”存在。如放任自流，一旦气候变化，流冰还有可能累积为冰块乃至冰柱。

邦交正常化以来，日中关系形成了三个历史性文件，并在这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发展。1998年，两国领导人之间互相约定要建立“为了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然而，“为了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条龙没有能够在21世纪的天空腾飞起来。原因在于，这条龙缺了点什么，似乎是缺了一双洞察全局和未来的眼睛。而现在日中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了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协议就是为两国关系的走向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巨龙腾飞的时机成熟了。

那么，“战略互惠关系”对于两国关系来说是什么样的一双眼睛呢？我想，可以称之为“望远之眼”和“大人之眼”。

中国古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日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共有“望远之眼”，以面向未来的精神，通过对共享战略利益的确认，来消除各种“近忧”。

中国古语还说：“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日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具备“大人之眼”，即对于对方国民内心所具有的担心和疑虑哪怕是微小的问题也不能等闲视之，对双方关系有益的事，哪怕再小也要竭尽绵薄。

在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过程中，真正达成战略互惠的目标，并使两国人民能够真正感受到切实利益，那毕竟是遥远将来的事。为此，需要有想象力即有远见之明者把握方向并告诉国民，这是日中两国政治领导人的使命。

“战略互惠关系”的推进，也必然会受到两国各自国内悲观主义者的挑战。他们会罗列各个领域的具体的摩擦事例，并反复地强调不要被对方的微笑战术所欺骗。在与这些悲观主义者的斗争中，一个接一个地积累起具体的互惠成果又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真正达成“战略互惠关系”，我有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放眼日中关系二十至三十年后的未来，应该就三个方面树立共同的战略目标：

- 一、建立起日中在亚洲全局“责任共有”的机制；
- 二、确认两国在亚洲都不谋求霸权；
- 三、欢迎美国也对亚洲共同分担责任。

第二，对于今日两国关系中存在的各项悬而未决的问题，应该放进“一揽子计划”里，寻求互惠解决的办法。

第三，胡锦涛主席致力于建设的“和谐社会”，其立足所在的“和为贵”的精神，实际上与日本“以和为重”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日中两国应该以这种“和谐精神”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并以战略互惠的实际成果展示于世界，来让东方的价值观普惠于全球。

日中之间有着其他的两国关系所没有的特殊性。福田首相2007年底访华专程去了孔子的故里曲阜，表明是“为了亲身体验日中两国在文化上的共同传承”，并题词“温故创新”。此行就是这一特殊性的体现。不管时代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日中两国可以共同寻找到《论语》等所包涵的共同的古典精神。

另一方面，因为看上去像“同文同种”，相似点很多，由此产生误解，认为对方的思维方式和自己都一样，这种不了解对方的误判反而又成了日中之间发生各种各样摩擦的主要根源之一。这样的误解也是日中之间“特有的误解”，它形成了未能积极去寻求“相互理解”的交往历史，至今这仍然在双方国民之间普遍存在这一现象。“相互理解”远远落后于关系发展的现实，这是会动摇两国间“相互信赖”关系树立的基础的，对这一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坦率地说，日本的中国专家们至今仍未能把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树立了构筑“和谐社会”目标并为此奋斗的真实面

貌客观准确地介绍给日本国民；同样，中国的日本专家们也没有能够把为了确立民主与和平路线而持续努力的战后日本道路的主流，把民主、和平、人道主义已经扎根而不可能重走老路的今天日本之大趋势真实充分地介绍给中国的民众。其结果，国民层次上的相互误解日积月累，导致深刻的互不信任，一有风吹草动，一件小事也会酿成大的风波和感情上的对立。

在21世纪之今天，这种相互理解之不足导致的消极后果将更加严重：因为日中两国已经并立为亚洲的两强，互相之间的猜疑和互不信任不仅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会对整个亚洲的发展趋势带来影响。两强相争，别的国家将无所适从，东亚共同体的未来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我的老朋友、东洋学园大学教授、日本华人教授会议代表朱建荣极力建议我把本书翻译后在中国出版，因此我写下上述致中国读者的序言。

中国前驻日大使、现任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现任驻日大使崔天凯，公使孔铉佑，公使衔参赞马继生、吴江浩，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沈国放先生等各位为了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提供了帮助，借此篇幅表示真诚的感谢。

如果中国朋友们能够通过本书了解现代日本真实面貌和经济政治社会的最新动态，从而增进相互理解，将不胜荣幸，这也算我对日中两国之间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略添砖瓦吧。

作者 中川秀直

了解经济大国日本未来的走向

——向中国读者推荐本书

本书是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原干事长中川秀直先生阐述其政治、经济以及外交观点主张的著作。

中川先生是当今日本非常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实力人物。2006年9月，安倍晋三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后，提名他任执政党干事长。此后近一年，中川作为自民党的二把手，总揽党的内务、政策制定和对外交流等。2007年7月底，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中川引咎提出辞呈，8月底正式辞职。9月12日，安倍突然辞去首相职务后，而中川秀直成为福田康夫出任新首相的几个主要幕后策划者和推动者之一。10月，中川就任他所属的自民党内最大派系清和政策研究会^①（即一般所说的福田、安倍、森喜朗派）的召集人。

中川秀直成为日本著名政治家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回过头去看，也许正是其多方面的工作经验、大起大落的政治生涯，造就了他广博的学识经验、纵横捭阖的协调能力和审时度势的判断能力。

^① 清和政策研究会，历承自民党内岸信介、鸠山一郎等所率派系之源流，由福田赳夫从首相职务引退后于1979年正式成立。历代召集人（即派系领袖）为安倍晋太郎、三塚博、森喜朗、小泉纯一郎、町村信孝等。从小泉内阁起扩展为党内最大派系。历史上该派主张修改战后和平宪法、扩充“自主军备”，鹰派色彩较浓，不过近年来这一色彩有所减弱。现任首相福田康夫也属于该派。

中川 1941 年 2 月 2 日出生于东京，1966 年毕业于庆应大学的法学部，随即进入日本经济新闻社当了一名政治记者。10 年后的 1976 年，继承其岳父中川俊思的选举区，在广岛竞选众议院议员，一举当选，从此走上政治家的道路。

初涉政坛，他是作为当时在日本政坛举领风骚的新自由俱乐部推荐的候选人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但在三年后的大选中落选。之后他脱离新自由俱乐部，加入自民党，于次年再次当选国会议员，但 1990 年又一次落选。两次起落后他专心做选举区内选民工作，于 1993 年高票当选，再次重返政坛，此后便连选连胜一直没有再落选过。

进入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川秀直开始崭露头角，历任国土政务次官、通产政务次官、自民党商工部部长等职务。1994 年社会党党首村山富市当选首相后，他任首相助理，负责两大执政党自民党与社会党之间的联络协调，从此进入日本政治的领导层。1996 年在桥本内阁首次出任部长级职务，任科技厅长官。2000 年，任森喜朗内阁的要职官房长官，进一步迈入政治核心圈子。2002 年，在小泉内阁时被任命为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担任各党派之间的协调。由于中川先生人际关系极广，擅长于寻找各方之间的折衷妥协，因此他连续三年留任此职，成为战后日本历史上任该职时间最长的人。2005 年 10 月，又出任自民党三大要职之一的政调会长，2006 年 9 月，出任自民党干事长。

本书日文原版书名为《上げ潮の時代——GDP1000 兆円計画》，于 2006 年 10 月首次由日本讲谈社出版。一出版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因为本书的核心内容是提出“涨潮”型的发展战略，与政府和执政党内原来占据主流的经济主张针锋相对，引发了执政党内和经济界的一场不小的论战。

后者的观点是，历届日本政府都是支出大于收入，几十年来大量发行国债以弥补税收不足，导致债台高筑，国家财政现

在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除非大举征收消费税，把现行5%的消费税率提高到10%甚至更高，否则就不可能缓解财政危机（日本还有学者警告有出现“国家破产”的可能）。但在发达国家，一旦提出增税，差不多每次都会遭到选民的反对，从而导致在国会选举中丢失大量选票。对此，发达国家执政党往往采取的对策是，能拖就拖，或者在竞选时不提，但在当选后暗渡陈仓，利用在国会的多数席位强行通过增税法案而付诸实施。90年代前期日本自民党提出征收消费税的法案，导致在国会选举时遭到惨败，之后历届内阁对于增税一事采取一拖再拖的办法，直至今日。但不少政府官员和学者认为日本财政危机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下去了。日本政府的负债额是在发达国家里最高的，而且迄今找不到对策，必然趋势是进一步恶化。因此，“增税派”认为，即使在选举时暂遭挫折，也应该以国家长远利益为重，正面应对“赤字财政”问题。于是，他们近年里明确提出了大幅度增税的主张，这一主张在执政党和政府内越来越被认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认同和支持者占据了主导地位。

对此，中川秀直先生出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后，在已有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正式主持展开了“日本经济3%增长率可行性研究”，设法寻找既不大幅度增税又能走出财政危机的“两全其美”的途径。该研究小组邀请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共同参与，经过近一年的内部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日本应该也可以开辟一条不用大幅度增税就能走出财政危机、还能重建日本经济信心的新的发展道路。该研究成果被中川先生采纳，作为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主张而公开提出，本书的第1章和第2章就是阐述这一主张及其论据的内容。安倍任首相后，该主张实际上成为该内阁的主导经济路线，福田内阁也基本认可这一经济发展战略，其思路体现在新内阁的不少政策中。

我觉得本书反映了日本执政党内根据本国经济特点又吸收

别国经验而提出的一些新思路、新主张，值得认真研究。该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实施适当的经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日本经济今后能够保持3%左右的实际增长率（而近十五年来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平均仅在1%左右），如再允许有每年2%左右的物价上涨率的话，日本经济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4%到5%的名义增长率。在持续增长的大背景下，辅之以削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等节源开流的措施，就可以做到既不增税，又能走出结构性的财政危机，并使日本经济到2020年之前名义增长率上翻一番。他们还认为，重点刺激经济增长的路线还将使日本经济恢复活力，重新占据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战略用中川秀直先生的话说，就是“涨潮”（水涨船高之义）路线。

中国读者可以从本书中首先了解到日本新一代领导人对未来日本经济走向的看法、思路及其可能的对应措施。和平崛起中的中国首先是经济崛起，这一过程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经济走向关系密切，但两者间究竟是相辅相成，抑或是此消彼长，我不敢断言，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两者之间有着很密切的互动作用。因此，更加关注日本经济的未来走向及其可能采取的新的战略策略，既是了解日本的一环，也是制定今后中国经济战略时考虑外部环境条件之必需。

其次，在本书中，中川秀直先生作为自民党主要负责人之一，总结了他所担当的国内选举对策的心得和经验，作出了“日本社会与政治已进入全新阶段”的判断，并为执政的自民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和对策。比如，中川先生认为派系政治和利益诱导型政治（这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政治的特征）已经一去不复返，政治运作和选举必须面向一般民众，正面回应选民的各种要求；要致力于缩小各阶层的收入差距，敢于向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的工资过高等“圣域”（这一特点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日本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刀；要修正中

央集权的传统结构，发挥各地方的积极主动性，建设均衡发展的分权型国家；把公共服务业进一步向民间开放，以削减政府开支并促进竞争，等等。面对新的社会状况，他又提出了一系列如何观察与吸收民意的办法，并对自民党的自我改革以及党的未来走向，作了一些建议和设想。

中国与日本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但现在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政治体制及其变化发展，同属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部分，有可以借鉴之处。2007年12月24日版的北京《环球时报》刊登了“日本政治家扎根基层的启示”一文，该文在日本也受到关注，说明中日两国之间可以超越政治体制的不同，在执政党的反腐败、立足民众等对策措施方面能够相互比较和借鉴。通过本书，中国读者也能够了解到日本政治新的变化及其一些趋势走向，还可以作为“他山之石”，引为参考。

本书的第3章是有关亚洲外交和中日关系的内容。中川先生提出了“新亚洲主义”的主张，呼吁亚洲各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和相互认知了解，他认为亚洲的未来走向应该是“开放型的自主亚洲”。其中他把主要篇幅用在中日关系上，主线是主张积极发展两国关系，中日之间建立对等、互惠的新型关系。在本书中文版里，中川先生又特意补充了日文版出版以后他在各种场合所做的有关中日关系的一些新的阐述。

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中日之间达成了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协议。“战略互惠”一词是日方首先提出的，据说采用“战略”一词是对中国外交经常使用该词的一种善意回应，另有不言之意是强调日本与中国同属“战略性大国”；“互惠”一词据说也有对中方经常使用“双赢”一词的回应，同时又为安倍首相在上台之前多次强调与华“对等”的言论张目。但安倍访华时又几乎没有提出“战略互惠关系”的实质性内容，那还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对此，中川先生广泛听取各方

意见后，提出了不少新的建议，其中不乏建设性的构思，可以视为是对充实“战略互惠关系”内容的一种努力。调整了小泉内阁时代在历史问题上与中国全面对着干的路线，功不可没。虽然有所摇摆，但正是在安倍内阁期间中日关系由破冰到融冰，从而使新的福田内阁期间迎来了中日关系的新的春天。对此，中川先生作为安倍内阁的执政党干事长，台前幕后为促进首脑交流以及“战略互惠关系”的充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的来说，中川秀直先生一直主张尽快克服两国间的各种问题，积极促进与中国建立长期友好稳定的关系。2005年，他在日本富士电视台的讨论节目中提出了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打开僵局的颇为建设性的意见。我也参加了那次电视讨论，事后了解到中川先生为此受到日本强硬派的不少攻击。在小泉首相执意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之际，中川先生的这一努力还是难能可贵的。他曾多次访华，尤其是在2006年2月率领日本执政党代表团到北京与中方进行执政党对话，为摸索打开中日关系起了架桥的作用。2007年2月他作为自民党干事长访华时，胡锦涛主席与之进行了会见和深入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我个人与中川秀直先生有几年的交往，对于他作为政治家的素质和对促进中日交流的热情，是很敬佩的。有一次他与我们日本华人教授会的十来位教授学者共进午餐，除了我，其他人他事先都不认识，但在饭后他与中国学者送别时，一一握手并能记住并叫出对方的名字。这也许是日本政治家为了在选举区拉选票必须磨练的一个“基本功”，不过仍然给中国学者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外，我们在日的中国学者为了给国内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一些日本的经验正想找日本政府官员了解有关情况，中川先生听说后为我们牵线搭桥，在他任自民党政调会长时起，在会长室组织了“战后日本发展的经验教训学习会”，其后中川昭一、谷垣禎一两位先后继任政调会长后该会一直延续下来，先后请来政府有关部委的负责人，举办了“如

何通过税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日本在日美贸易摩擦中的对策”、“日本加强食品安全的对策”等专题讨论。我们还想了解日本在举行大型国际活动（奥运会、世博会等）时的反恐和维护秩序方面的经验，中川先生作了不少工作，才促成了这方面的对话交流。

中川秀直先生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他的主张当然不能用中国的思路去套，我们也不必强求他与中国在各方面一致。但我想，通过阅读本书，还是可以对日本国内的一些新的情况，尤其是自民党领导人对经济、社会、政治的走向的观点，对中川本人和他所代表的“新亚洲主义”立场有所了解。增进中日间的相互了解，对双方都是需要的。

本书在中文版的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川先生本人大力协助，中国驻日大使馆也为本书中文版的顺利出版穿针引线。由在日中国留学生组成的“东学会”成员王雪萍（关西学院大学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专任讲师）、张剑波（早稻田大学专任讲师）、杨志辉（博士，惠泉女学园大学准教授）、祁景滢（博士，樱美林大学非常任讲师）担当了初稿翻译，李彦铭（庆应大学博士前期课程）等也参加了翻译工作。王智新教授（日本圣托马斯大学）帮助翻译了部分附录，看了初稿，还为本书出版作了不少联系工作。我翻译了作者为中文版追加的内容，作了统稿，写序，并为本书加了注释。王智新（日本圣托马斯大学）教授作了统稿，吴茂松（庆应大学博士后期课程）、李彦铭（庆应大学博士前期课程）等也参加了翻译工作。在此，还要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沈国放总编辑等各位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心血。

朱建荣

（日本东洋学园大学教授）

原序：日本 GDP 应该能再翻一番

小泉纯一郎内阁以“没有改革就没有成长”为口号，成功地使日本经济实现了“从负增长到零增长再到正增长”和“从不正常到正常”的转变。安倍政权继承其改革的火炬，把实现日本经济“稳定的正增长”作为自己的政策方向，坚持使日本经济走重视增长的道路。

如今日本的政治已经由主张“改革”的小泉内阁和重视“增长”的安倍内阁过渡到提倡“综合平衡”的福田内阁。

我认为，经济增长的幅度可能会有高有低，但是，日本的经济政策的目的，应该就是使经济不出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在先进国家乃是理所当然的4%的经济名义增长率也应该是日本的努力目标，而且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日本经济以名义增长率4%的速度发展，那么，十八年以后，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就能再翻一番，从现在的500兆日元增加到1000兆日元。也就是说，现在刚出生的婴儿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或者是现在20岁的青年到了38岁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现在50岁的壮年到了68岁考虑是选择继续工作还是靠年金过悠闲自得的生活的时候，日本的生活水准已经翻了一番。而且，经济发展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良药。

“弱肉强食的社会”是以牺牲弱者为代价只有强者繁荣的社会。对于一直以来有着推己及人互相帮助传统的日本人来

说，这样的社会是最被人厌恶的社会。

但是，有人想利用日本的这一传统，在“无收入差距的社会”的名义下，建立“强肉弱食的社会”。他们的想法是，不需要努力，强制性地把有钱人的东西拿来大家分了就行了。其结果就是计划经济的共产主义社会，努力奋斗的人都会跑到国外去。

要阻止你吃我我吃你的“弱肉强食社会”的到来，我们需要的不是日本的共产主义化，而是经济增长。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经济增长，可供分配的财富就会增加。建立了战后日本税制基础的盟军总司令部（GHQ）经济顾问约瑟夫·道奇1949年在声明中说：“财富只能是在被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分配。”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具备弱者和强者都富裕起来的条件。所以，在围绕经济差距的争论中，我一贯主张：“经济增长是缩小差距的良药。”

导致“弱肉强食社会”的最大诱因，是长期性的零增长、负增长。在零增长、负增长的情况下，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要想工作，已经就业的人里面就必须有人失去工作退出来。反之，在零增长、负增长的情况下，如果要维护已经就业者不被解雇，那么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就很困难找到工作。

不少年长者叹息刚刚毕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成为自由职业者。我希望这些年长者能够做进一步思考：在零增长、负增长的情况下，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规雇用，才导致产生了对年轻人的非正规雇佣。

正是零增长、负增长，使刚毕业的孩子与他们的父母之间形成互相威胁对方饭碗的关系。

刚毕业的年轻人能找到工作，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失业，年轻人的时代的生活能够比他们父辈的时代的生活富有——要建设使这些成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增加财富，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绝对的前提条件。必须实行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使全

体日本国民都赶上“涨潮”的政策。

这是我自 2005 年 10 月底担任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以来，自命为“日本经济增长会会长”，一直提倡成长战略的理由之所在。

对我的“涨潮”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

有人说：

“日本已经很富有了，不需要经济增长了。”

但是，这是取得了成功的那部分人的想法，这部分人能够有保障地得到稳定的高收入。这种想法是剥夺年轻人取得人生成功的权利的想法。

有人说：

“进一步发展经济会增加地球环境的负担。”

这一说法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不过日本的环境技术在全世界是最优秀的，我们可以运用日本的这些技术，使今后生活水平会提高的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两全其美。

有人说：

“已经这样富裕了，东西这么多，经济增长已是不可能的了。”

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比日本还富有的美国能够一直保持着经济增长呢？还有，如果大多数日本人真的对现状很满足，就不会出现日趋激烈的有关经济差距的争论。其实大家都想更加富有。这个想法也是取得了成功的那部分人的想法。

有人说：

“但是必须考虑到日本经济的实力。”

对这个问题必须从正面做出回答。

“乐观是意志，悲观是批评。”作为一名政治家，我认为我必须是一个“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因为，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可能实现超乎自身想象的理想。

例如，如果大家都认为日本经济只能实现 1% 的增长，那